

少数民族教育史

第二卷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

◆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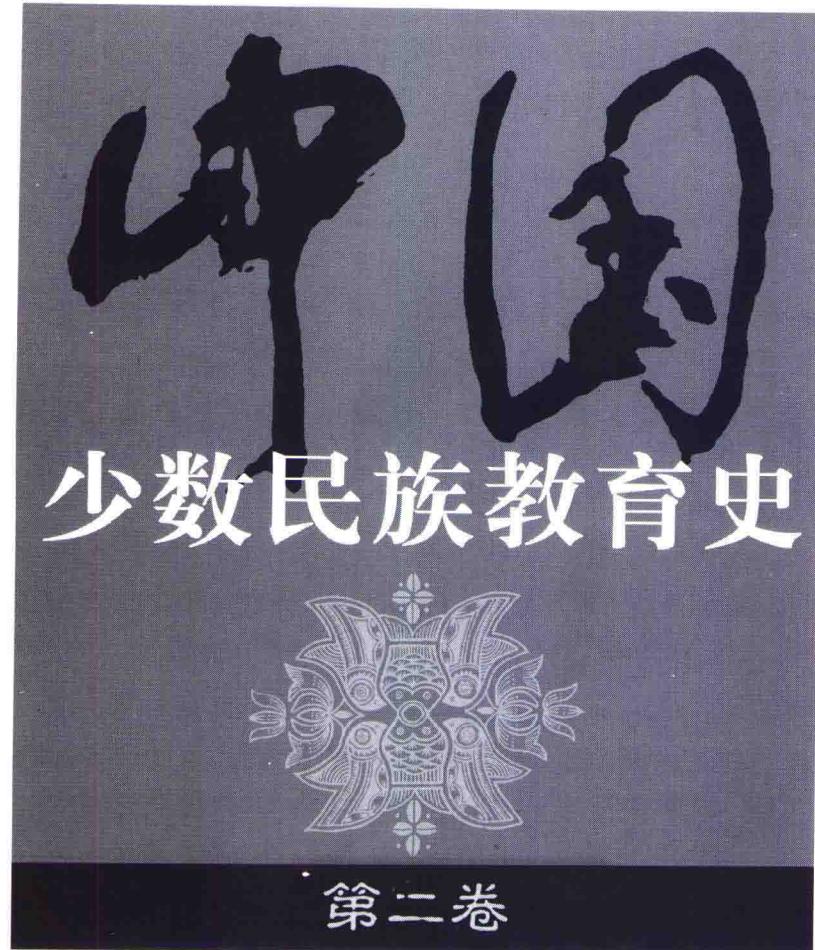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编委会 编

◆主编 韩达



◆云南教育出版社
◆广西教育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
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编委会 编

◆ 主编 韩达

◆ 云南教育出版社 ◆ 广西教育出版社 ◆ 广东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 第二卷 /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编委会编；韩达主编。—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 12
ISBN 7-5415-1508-6

- I . 中…
- II . ①中…②韩…
- III . 少数民族教育 - 教育史 - 中国
- IV . G759. 2

云南教育出版社
广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广东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书林街 133 号)

邮政编码：650011

深圳当纳利旭日有限公司印刷

(深圳市振兴路 418 栋中门二楼)

850×1168 毫米 16 开本 84.5 印张 1 890 000 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ISBN 7-5415-1508-6/G·1340

定价：227.00 元

总序

韩达

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民族大家庭中，各族人民携手并肩，经过长期的自然斗争、社会斗争，共同开发锦绣山河，缔造了漫漫 5 000 年的辉煌历史，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除汉族外，我国现有 55 个少数民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9%，分布地域却占全国总面积的 50%~60%。他们大多居住在偏远边陲，沿东北边陲逆时针转，直至台湾省，略呈“C”形绵延而布；内有跨国而居民族 31 个。这种地望分布，决定了少数民族在保卫和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拓通内外交流和友好关系等方面，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然而，鉴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一般地讲，边疆逊于内地，少数民族逊于汉族。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建设好广袤的民族地区，做好边境工作，对于促进全国现代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意义。可以说，没有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和繁荣，就不可能实现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务之急。

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国家的振兴，民族的昌盛，应以教育为本。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邓小平曾在 1983 年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战线任重而道远。出于培养民族人才的紧迫感，毛泽东早在建国伊始就明确批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

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民族教育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为此，古往今来都较滞后的民族教育，更当奋起直追。

值得注目的是，民族教育既有不少相通于全国教育的共同规律，也有许多独守不群的特殊规律。这些特殊规律，是自千百年间形成赓续而来，必有其历史的、现实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因此，从这一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掌握和运用各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规律，对于全面鉴古观今、深入研究和掌握整个中华民族的教育发展及其规律，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意义。无视或忽视这一点，必难找到堪称“中华民族教育”发展的完整的脉络，自然也必难写出科学而完整的《中国教育史》。而问题正在于，实际情况却未能尽如是意。少数民族教育如此纷异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迟迟未有必要的考察、研讨和反映，实属历史的失误和偏颇。

我们感到庆幸，当今中国教育界或教育史学界中，许多有识之士业已达成上述共识。早在1979年冬，中国教育史研究会成立之时，就决定组织力量研究、纂修《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

然而，偿还这笔不轻的历史旧债，却非易事，纂修任务经年累月难以落实。作为中国教育研究战线的一名老兵，我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我深知，偿还文化领域的历史欠债，带有抢救性质，迁延日久，难度逾甚。为此，我自1990年起，毅然发动并组织先期筹划。经奋战两度寒暑，至1992年6月25日，人们企足以盼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经国家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立项，正式获准上马。当时，上马经费拮据，人力不济。我旋以耄耋之年，奔走全国各地，求得各方支援。于是，这一光荣、艰巨、浩大、系统的民族教育研究工程，终于赫然启幕。

如上所述，我国少数民族及其教育，向来发展不平衡；而其教育史的研究，更是底子薄、起点低，普遍滞后。不少民族的教育史研究，既无古典文献可考，也乏口碑访录可稽，只能从头做起。如，云南学者承担的该省独有11个民族的教育史，即为破天荒的滥觞之作。如此开拓性的教研巨制，从初稿构架撰写，到稿文一统整容；从史料鉴别筛选，到成稿审定把关，其繁其难，又曷可胜言哉？须知，上马只解决了硬件难题，而更难的是上马后的软件障碍——民族教育史的若干学术问题。举其大端盖有：

一、关于民族教育分类

教育类型的划分，对于一般的教育史来说是并不困难的；而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极不平衡，教育发展千差万别，其分类却难统而划一。

要在民族教育史纂修中，对其多彩教育进行科学分类，恐需通横达纵，就差论别：既看历史横断面上各民族的教育水准，又看各民族历史纵剖面上的教育进程，经纬交织，而以“史”贯之，酌予特殊的厘定。基于同样原因，加之可考文献资料甚少，这种厘定难免语焉不详，只能粗略为之。鉴此，我们便从“大教育”出发，循“各族史”而行，爬梳为如下诸类，即：原始社会残余形态的原始教育，奴隶社会形态的初级文明教育，封建社会形态的多

元教育，近、现代学校的正规性教育，革命根据地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学校规范化教育，等等。

在古往的历史纵面上，各民族受中央政权的管辖情况颇多不一，其教育所受辖制和影响亦大相径庭：按王朝一统要求兴教授业者有之；循本民族特有模式自行其“教”者有之；王朝一统教育与民族模式并行不悖者有之……纂修民族教育史，既应沟通现行《中国教育史》，更应着眼于各民族特有的传统教育，诸如：适应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劳动教育，立足不同社会历史背景的生活、风习、德行教育，伴随不同意识形态的宗教信仰教育，以及服从特殊生存发展需要的畜牧、射猎、征战的骑射教育，等等。这些教育，多以社会实践和家族传承形式为之，或以学堂（学校）、寺庙授业等渠道进行。其中，表现为“以育人立世为主旨，以目染耳濡为能事，饱涵社群色彩的整体社会的日常教化”，在各民族教育发展中，沛然各扬其长，尤为重要。作为民族特色的教育，自当着力书之。

在现、当代历史横面上，革命根据地及建国后的民族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灿烂一新的民族教育。从“量”的规模来讲，它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翻倍增长，乃至零的突破；从“质”的品类来讲，它实现了跨越一个或几个世纪的历史性升华，走上了真正的人民教育之路和科学的民族兴教之路。作为民族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举，中国共产党于1941年在延安创办了民族学院；建国后更相继创办了西北、中央、中南、西南、云南、青海、广西、广东、贵州、西藏、东北、西北（第二）等民族院校，首开民族高等教育之先河，使民族教育终于全面跻身多层次、多学科的现代规范化教育之林。民族教育如此壮丽的长足跃进，更当椽笔浓墨，大书特书。

二、关于历史分期

这里所说的“历史分期”，是指《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的历史分期，与现行《中国教育史》的历史分期的关系问题，亦即民族教育史的“断代”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各少数民族地区并存着多种社会形态，自前资本主义的封建制（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上溯至农奴制、奴隶制，乃至原始公社末期，几乎史有尽有。其发展进程，普遍后于内地汉区；其结构也异常复杂，极不平衡，甚至同一民族因分布地不同也殊异。这大体有四种情况：一是略同汉区，已进入封建社会，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如回、维吾尔、苗、壮、布依、朝鲜、满、侗、白、土家等30余个民族，蒙古、彝、黎等族之较大部分，以及藏族之小部；二是尚存封建农奴制或封建领主制，如藏、傣、哈尼等族之大部或部分；三是尚存奴隶制，如大、小凉山的彝族；四是尚存原始公社制残余，如傈僳、佤、景颇、独龙、基诺、怒、黎、高山、鄂伦春、鄂温克等族之部分或小部。他们的政治制度复杂纷繁：有的辖从于历代中央王朝；有的则各自为“政”，如西藏藏族的“政教合一”、凉山彝族的“家支”、西双版纳傣族的土司制度和残存原始公社制民族的“长老政治”，等等。

各民族如此杂沓的历史进程，实难划一于中央王朝的历史分期。相应地，其教育史的历

史分期，就只能从各民族实际出发，分别酌处：凡能参照朝代史划分者，按朝代史记述；否则，按大的年代史、世纪史划界；上溯数百、上千年，社会形态无大的质变，查无明确断代界限者，则统称曰“解放前”的教育发展史。

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民族教育的历史发展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本书力求如是，也只能如是。

三、关于地望分布

这里所说的“地望分布”，是指本书如何处理各少数民族地望分布，与历代中央王朝行政区划的关系问题，亦即民族教育史的地望定位问题。

时间是空间的历史；空间是时间的地望。史、地如影之随形，密不可分。修史必涉地望。各少数民族的分布状态，历来十分复杂。纂修各族教育史，必须弄清其社会活动地望。而各族活动地望却变迁无常，有的尚可观照历代的行政区划，有的则因区划史料过略或遗缺而无从考究。鉴此，本书只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范围为基准。按其行政区划去大体指代某族彼时活动之彼地。其中，在历史上曾一度或一再迁徙者，逐次注明其变迁路线，庶几与《中国教育史》的地望同步对接。

我国少数民族的地望分布，宏观可谓“大杂居，小聚居”，自古而然，鲜见例外；微观细而分之，可胪三类：一是大集中、小分散，如蒙古、回、藏、维吾尔、壮等族；二是小集中、大分散，如苗、彝、布依等族；三是全民族聚居于一二省区的局部地域，如裕固、独龙、鄂伦春、基诺等族。就人口布局而论，55个少数民族中，除大部分聚居边疆和民族自治地方外，还有回、满、蒙古、朝鲜、苗、瑶、畲、土家等民族的约1000万人杂居、散居在全国各地城乡。

针对上述民族分布状况，除聚居一地者外，本书均以其集中部分为研究主体，解剖麻雀，略窥其概；同时兼采其分散部分之特色精华，以周其全。如，蒙古族教育史，以内蒙古的蒙古族教育为主体，兼及青海、新疆等省区；壮族教育史，以广西的壮族教育为主体，兼及云南、广东等省。

此外，还有一些学术问题，堪称民族教育的特中之“特”。如，双语教学手段、寺庙经院教习、多元文化影响，以及民族心理濡染，等等，本书则按特殊矛盾作特殊分析，或略或详，或聚或散，平实、审慎地记述之。

上述学术问题，经编委及作者各方悉心研讨，锐意攻错，现已大体化解。尤为幸者，率先成书、尚带试编色彩的这些书稿，业已得到各方人士的热情肯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专家审稿，明文鉴定道：书稿“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少数民族的教育历史，阐述党的民族政策，在资料缺乏，可资借鉴的史料不多的情况下，所取得的成绩是可贵的。它们填补了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某些方面的空白，均达到了出版水平”。书稿相应的一些民族地区，还专门举行学术讨论，赞之为该“民族教育研究的新成果”；有的民族地区，还授之以“科研一等奖”。

卷帙浩繁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先行出版的凡三卷，约 550 余万字。它涵盖了蒙古、回、藏、维吾尔、彝、壮、布依、朝鲜、满、瑶、白、土家、哈萨克、傣、黎、高山、东乡、纳西、达斡尔、仫佬、羌、毛南、保安、裕固、京、基诺等 26 个民族的教育史。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第一卷，收集了《回族教育史》、《维吾尔族教育史》、《朝鲜族教育史》、《满族教育史》、《哈萨克族教育史》、《东乡族教育史》、《达斡尔族教育史》、《羌族教育史》、《保安族教育史》、《裕固族教育史》；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第二卷，收集了《蒙古族教育史》、《藏族教育史》、《彝族教育史》、《白族教育史》、《傣族教育史》、《纳西族教育史》、《基诺族教育史》；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第三卷，收集了《壮族教育史》、《布依族教育史》、《瑶族教育史》、《土家族教育史》、《黎族教育史》、《高山族教育史》、《仫佬族教育史》、《毛南族教育史》、《京族教育史》。暂未列入的其余 29 个民族——苗、侗、哈尼、傈僳、佤、畲、拉祜、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布朗、撒拉、仡佬、锡伯、阿昌、塔吉克、普米、怒、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德昂、塔塔尔、独龙、鄂伦春、赫哲、门巴、珞巴族的教育史，敬祈民族教育战线等有关单位，继续组织专家、学者纂修，以使本书能囊括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古今教育的发展丰姿。

平心而论，本书的纂修出版，对于中国民族教育史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教育史学界，必将作出显著的贡献。首先，它为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的学科体系，拓展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填补了现行中国教育史的一大空白。其次，它有利于弘扬少数民族教育的优秀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凝聚力，深入进行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教育。再次，它从少数民族教育的实际出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族特点相结合的民族教育事业，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科学决策的依据。此外，它还锻炼了一支少数民族教育史的科研队伍，增强了民族教育研究的发展后劲。

这部异彩纷呈的教研巨制，是集体力量和智慧的结晶。付梓在即，我格外难忘各方仁人对本书的参与和扶持；广东、云南、广西三家教育出版社慧眼高瞻，始终鼎力支持出版；山东曲阜市巾被厂孙钢梁厂长等，热心民族教育，慷慨出资匡助；京内外 40 余位专家学者，民族教育战线诸多领导、管理干部，争相奋袂应援。没有他们殚精竭虑的参与和扶持，断无今日之成就。我还要特别提及，陈声远、李彦福、韦善美、孟作亭、张为珍、栗洪武、赵一兵、熊明安、冯春林、马加林、李耀宗诸方家，为组织、撰写和支持出版，倾注殊多辛劳；国家民委教育司组织专家审稿，严格把关，体惜入微。在此，请让我一并鸣谢！

古语云：“始生之物，其形必丑。”本书旷古“始生”，舛讹欠当之“丑”，或不鲜见；文稿通贯之失，在所难免，令人喜中隐忧。这里，我谨代表编委会，恳请广大读者、同行，不吝赐教，俾既出之卷日臻完善；也恳望有关省区人员等，协力有加，修竣未就之卷，以使本书早日完璧。

本卷总目录

蒙古族教育史	1
藏族教育史	157
彝族教育史	481
白族教育史	673
傣族教育史	907
纳西族教育史	1049
基诺族教育史	1205

蒙古族教育史

MENGGUZU

JIAOYU SHI

特格舍 周玉树 / 著

分序

特格舍 周玉树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蒙古族是其重要成员之一。蒙古族又是一个世界性民族，散居在很多国家。在祖国大家庭里，许多世纪以来，蒙古族人民以其勤劳、勇敢、智慧，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为我们国家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研究蒙古族的历史，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多年来，关于蒙古族历史著述颇多，但其中关于蒙古族教育史方面，却仅有散见的论文，而无专门著作。这是非常遗憾的，也是亟需填补的空白。

受“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编委会”主编韩达的委托，我们不惮谫陋，于工作和教学间隙，经过几年的努力，写成了《蒙古族教育史》。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以学校教育与教育行政管理为主的原则，同时兼顾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鉴于蒙古族历史与地理分布的特殊性，本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内蒙古族教育史的状况，而蒙古国和散居在其他国家蒙古族的教育史情况，本书未涉及。

按照学校教育的发展情况，蒙古族教育史一般可分为蒙古汗国、元、明、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六个阶段。为反映蒙古族教育发展全貌，在学校教育史之前增加了“原始蒙古人教育”一章。纵观蒙古族教育的发展曲线，大抵是元代和清末民初为两个高峰，明代为低谷，而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近50年，是蒙古族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蒙古族教育史》

力图反映蒙古族各个时期的教育状况，以及蒙古族在教育事业上所做的独特贡献。

蒙古族教育史原分上卷部分（第一、二、三、四、五、六章）和下卷部分（第七、八、九、十章），为遵守本书的统一要求和编排体例，后改为按时期编排章节，即第一、二、三、四、五、六章由特格舍同志编写，第七章即1947年至1989年的蒙古族教育由周玉树同志编写。限于我们的水平和编写时间仓促，《蒙古族教育史》肯定有不少疏漏和错误之处，恳请专家学者和读者不吝教正。

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对给我们支持和指导的同仁们一并致谢！

1996年12月8日

分 目 录

第一章 原始蒙古人教育	7
第一节 教育的内容	7
第二节 教育的方法和作用	17
第二章 蒙古汗国时期的蒙古族教育	20
第一节 蒙古汗国教育勃兴的基础	20
第二节 蒙古汗国教育概况	23
第三节 蒙古汗国教育的特点和意义	28
第三章 元朝的蒙古族教育	30
第一节 元朝的文教政策和教育行政制度	30
第二节 元朝蒙古族的学校教育	35
第三节 元朝蒙古族的科举	41
第四章 明朝及北元时期的蒙古族教育	44
第一节 明及北元时期蒙古族教育的社会基础	44
第二节 蒙古汗王的教育法规	46
第三节 蒙古族教育的途径	48
第五章 清朝的蒙古族教育	51
第一节 学校教育	51
第二节 师范教育的初创	61
第三节 教科书与教学用书的编写、翻译和出版	62
第四节 蒙古族留学生教育	63

第五节	清朝的蒙古族科举	65
第六节	清朝的蒙古族教育家	77
第六章 中华民国时期的蒙古族教育		80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各种教育政策和制度	80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蒙古族教育机构和团体	91
第三节	民国时期蒙古族的学校教育	92
第四节	蒙古文教科书的编辑和出版	98
第七章 新中国的蒙古族教育		101
第一节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蒙古族教育	101
第二节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蒙古族教育	111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及拨乱反正时期的蒙古族教育	134
第四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蒙古族教育	139

第一章

原始蒙古人教育

第一节 教育的内容

氏族社会早期，蒙古人的教育内容是简单的，及其晚期，则已十分丰富。它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产知识和技能的传授

氏族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为了满足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需要，求得生存，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生产劳动上，教育自然也就围绕着生产劳动来进行。

1. 狩猎

狩猎本为蒙古族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即使是后来进入草原的部落，也仍需“自春徂冬，旦旦逐猎”^①，作为生活的补充。其所猎者，“曰兔、曰鹿、曰野彘、曰黄鼠、曰顽羊、曰野马、曰河源之鱼”^②。狩猎的方式，有一人一家的行猎和整个氏族以至若干氏族联合起来的围猎。各种猎物的

① 赵珙：《蒙鞑备录》。

② 彭大雅：《黑鞑事略》。

习性，踪迹的探索，猎取方式的选择，捕猎的技术，都需通过教育、学习来掌握。

《黑鞑事略》记蒙古族围猎云：“凡其主打围，必大会众，挑土以为坑，插木以为表，维以毳索，系以毡羽，犹汉兔置之智，绵亘一二百里间，风扬羽飞，则兽皆惊骇而不敢奔逸，然后蹙围攫击焉”。规模之宏大，气氛之激烈，实在令人惊心动魄。而其组织之周密，纪律之严明，猎技之高超，又不能不归功于训练。《蒙古秘史》载孛端察儿孤苦无依时，用鹰、用弓箭、用马尾毛做成的套来捕猎，猎物多得吃不完，挂在枯树上都臭了^①，同样可以看出蒙古族猎人的训练有素。

2. 游牧

畜牧业在蒙古族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逐渐扩大的，终至“全部财产皆在于是”，“家畜且供给其一切需要”^②。游牧是生产的主要方式，生活的根本来源，其教育的内容自然十分广泛，下面略举其要：

草场的选择与保护。水草是牲畜繁殖的决定因素，畜牧业发展的基础。而蒙古高原的“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至八月又枯”^③，当时的牧业又只是“随其草之青枯野牧之”^④。因此，必须懂得“遇夏则就高寒之地，至冬则趋阳暖薪木易得之处以避之。过以往则今日行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⑤，方可恰当地选择，合理地利用并保护草地，保障人畜的饮食与安全。

古列延的安排。古列延（一作库伦）是蒙古族12世纪后期从札刺儿人引进的一种集体游牧、共同驻屯的方式。史料上曾记载：“古列延的意义即圈子。在古代当任何部落在任何地方居住时，他们布列得好象圈子，而其首领住在圆圈的中间，类似中心点，这就是古列延”^⑥。在生产力低下，人们不能独立放牧和保护畜群、无法单独同大自然和野兽斗争、无力单独抗拒外族进犯的情况下，古列延这种依靠集体维生的形式，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它需要有相当高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的人。

放牧的方法。随着畜牧业的发展，蒙古族畜养动物种类最多的时候有“牛、马、犬、羊、橐驼”。放牧的方法是分群放牧，即使同一类牲畜也以牝牡老幼分群，不可杂牧。如：“移刺者，公马也，不曾扇，专管骒马群，不入扇马队。扇马、骒马各自为群”^⑦。牧人也因畜异而分工放牧，有“放马的”、“放羊的”、“放羔儿的”、“放骆驼的”^⑧之别。如何分群，如何根据牲畜的不同特点选择牧场，进行管理，都需要有相应的知识。

养畜的方法。《黑鞑事略》载：“其牡马留十分壮好者作移刺马种外，余者多扇了，所以

^① 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1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版。

^② 多桑，冯承钧译：《蒙古史》上册，29页，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

^③ 彭大雅：《黑鞑事略》。

^④ 赵珙：《蒙鞑备录》。

^⑤ 张德辉：《边堠纪行》。

^⑥ 同③。

^⑦ 同③。移刺，蒙语的正确的发音应为阿吉日嘎。

^⑧ 参见《蒙古秘史》。